

白先勇 白崇禧将军台湾岁月

冰 云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两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物

刘平章 我的父亲刘文典

「二十一」

刘瑞琳 主编

温故



苏小和 财会知识分子顾准

沈 芸 两代人的“战争”与和平——回忆李子云阿姨

阿 班 铃木的使托

孟卫东 新四军与泰州二李

父亲秦汾和丁文江先生说起

——兼述六十年前的陈素卿旧案

吴大年 劳动大学遇险记

张砚山 我住过的四合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故 (二十一) / 刘瑞琳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95-0898-3

I. ①温… II. ①刘… III. ①中国历史: 现代史 - 史料

IV. ①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514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曹凌志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 作: 陈基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00 千字 图片: 74 幅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目 录

特 稿

刘平章 我的父亲刘文典 _ 1

不能不提一下沈从文的事情了。沈从文在昆明的那段时间，住在丁字坡旁边，也就是以前的唐公馆对门，而我们家住在龙翔街。住在丁字坡的人跑警报，往往是跑以前的英国花园或现在的圆通山后面。我们跑虹山，他们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而且我们没跑几次就搬到了官渡。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这个故事。而且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父亲已经离开联大到了云大，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冰 云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两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物 _ 20

托洛茨基是世界各国托派组织的精神导师，而陈独秀是中国托派中最知名的领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思想及后半生命运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托洛茨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历程。

人 物

张耀杰 胡适与辜鸿铭的精神碰撞 _ 36

胡适与前辈文化人辜鸿铭之间，一度处于激烈碰撞的敌对状态。辜鸿铭离开北京大学英文门一级教授的职位，也主要是出于英文门的教授会主任胡适的提议。但是，离开北大之后的辜鸿铭，与胡适之间依然保持着相互尊重、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交。

孙 卓 裴文坦的故事与事故 _ 53

胡美箴路蓝缕在中国湖南开创现代医学教育之基业，曲折悲壮，继其后献身于中国医学事业的外籍人士更不乏其人，为此殒身蓝天的裴文坦就颇值得一书。

苏小和 财会知识分子顾准 _ 61

历史，对顾准真是恩惠有加，似乎自始至终就是想把顾准培养成中国最杰出的财会知识分子。当王志莘、潘序伦、孙治方、骆耕漠、吴敬琏这些卓越的名字，集体出现在顾准的世界里，他成为中国最杰出的财会知识分子，几乎就是一种必然。

沈 芸 两代人的“战争”与和平——回忆李子云阿姨 _ 66

王蒙有过一说，夏衍是高度被政治化的，却保留了自我的私人空间，没有被彻底地政治化掉。我想他的这一准确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李子云。爷爷的“四合院”大门一关，门里门外是两个世界。

影 像

白先勇 白崇禧将军台湾岁月 _ 77

1949 年最后一天, 12 月 31 日, 父亲由海南岛海口飞到台湾。那正是大陆失守、天崩地裂的一刻, 疑危震撼, 谣诼四起, 许多人劝阻父亲入台, 认为台湾政治环境对父亲不利, 恐有危险。当时父亲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 但他毅然到台湾。用他的话说, 这是——向历史交待。

往 事

张振文 一百年前孙袁会 _ 127

1912 年夏, 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进京共商国是。在北京, 孙中山逗留了二十五天(8 月 24 日至 9 月 17 日), 前三天几乎每日与袁世凯面谈, 最高记录从下午 4 点聊至次日凌晨 2 点,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阿 班 铃木的使托 _ 138

近卫文磨是甘愿被日军中的好战派当工具使的。但因为性格关系, 他对此也常有疑虑, 患得患失。他至少有两次暗中行事, 希望做出妥协, 终止在华战争。其中一次, 他让我充当他的密使, 向蒋介石面陈他的想法。

孟卫东 新四军与泰州二李 _ 145

新四军进入苏北。紧挨着叶飞部队的是苏北国民党军第二大势力, 泰州两李的人马。所谓两李就是李明扬和李长江, 他们的职务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统领着一支号称三万, 实则两万多人的杂牌军。

记 忆

杨嘉实 1938 年: 湘黔滇之旅 _ 155

秦宝雄 往事杂忆——从父亲秦汾和丁文江先生说起 _ 170

亮 轩 最后的张白帆——兼述六十年前的陈素卿旧案 _ 188

周素子 西域探夫记 _ 199

吴大年 劳动大学遇险记 _ 206

张砚山 我住过的四合院 _ 213

陈仁德 张幺姐 _ 233

郑必珍 四季 _ 237

李绍明 村中人物 _ 242

特 稿

我的父亲刘文典

刘平章口述 张昌山、卫魏、刘兴育、姚铁军等整理

前记：关于刘文典先生，早已流传许多故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犹如雾里看花，云中望月，让人不辨真伪。今特访刘文典先生之子刘平章先生，希望能从他对父亲的回忆中，觅得一些事踪，尽力还原一位真实的刘文典。

一、父亲的经历

曾祖父是安徽怀宁人，早年在合肥做生意，开了一家不小的布号，生活尚算富足。可惜没多久，遇上洪秀全打安庆，俗称“长毛作乱”，家里人把布捆在祖父身上，从城墙上吊下去，这样才侥幸逃了出去。平乱后祖父回到合肥，继承了曾祖父的旧业经营布号。

祖父育有六子二女，父亲是填房夫人所生，兄弟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有三个弟弟。八个子女中，要数父亲最聪明，祖父便很注重对他的培养。在他幼年时家里就请了私塾先生，教父亲读经书和古文。长到十二三岁，又请了当地美国基督教会医院的院士教他学习英文。就这样，父亲便早早地接触到了中国古典和西洋文化。稍大些，父亲便去了芜湖安徽公学读书，受教于陈独秀、谢无量、刘师培等名师。在研习学问的过程中，也接触到当时的进步思潮，并逐渐被其感染。后来又东渡日本，经人介绍结识章太炎先

生，遂成为章门弟子，研习经学和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回国并赶往上海。到上海后，父亲加入了《民立报》，担任编辑和英文翻译，与于右任和邵力子共事。当时，宋教仁、范鸿仙、景耀月、章士钊等都是《民立报》的编辑。《民立报》针砭时弊，揭露君主立宪骗局，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侵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号召推翻清政府，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孙中山是年赴上海时，首访了《民立报》，并为之作中英文题字，中文赠词为“戮力同心”，英文赠词为“Unity is our watchword”。这是父亲首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后来宋教仁遇刺，父亲和范鸿仙等人在《民立报》连续撰文，率先公布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真相，追缅逝者，声讨凶手。时隔不久，父亲与范鸿仙等人同赴安徽芜湖，决议成立讨袁第一军、第二军，酝酿讨袁行动。恰在此时，李烈钧在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后来“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通缉革命党人，父亲不得已再度赴日本，以记者身份与范鸿仙等人密切往来。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孙中山任总理。父亲经人介绍，宣誓入党，任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主要负责孙中山英文电报起草工作。期间，父亲还在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旨在介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进步潮流，成为《新青年》群体中首批重要作者之一。袁世凯倒台后，父亲由日本回国，经陈独秀引荐，在北大担任预科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员，同时担任《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6年，安徽准备筹建安徽大学，教育厅长洪逵向父亲发出聘函，邀请父亲主持安大筹建事宜，父亲欣然前往，并为筹措教育经费多方奔走，费尽心思。安徽大学成立后，父亲被推举为文学院筹备主任，并代行校长之职，主持校务。后来因在维护学生时顶撞了蒋介石，父亲于1928年辞去了安大职务，重回北大任教。第二年应罗家伦校长聘请，进入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同时在北大兼任教授。

据母亲讲，“二次革命”后我们家里非常穷，袁世凯又四处抓人，那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只好把所有东西都卖光了到日本去。直到1928年抵北平后，父亲先到北大教书，又到清华任教，家里的情况才好转。那个时候父亲



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会泽院。



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和儿子刘平章。

在北大和清华两处领工资，一个月大概有七八百块钱，家里雇着几个人，有一个黄包车专门拉我母亲去买菜，还买了部英国的小奥斯汀汽车代步，花了大约两千块钱。另外，我们家好像还在安徽买了栋房子，带有花园，后来被日本兵强占了。

当时，我们家有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还有母亲的乳母一家人。因为外婆在母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是由这位乳母带大的，所以一直就陪着这位乳母，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父亲也很尊重这位乳母。父亲让乳母的儿子去学裁缝，我们家的衣服都是他做的，他媳妇做饭，孙子便跟着父亲，相当于书童，帮忙倒茶水拿东西，父亲教他读书认字，还教英文，后来他做文章写字都很不错，比较有文化。另外，母亲的表弟陈迺吉也住在我家，他喜欢画画，家里就让他去学美术，本来是要送到美专深造，因日军入侵，没有办法便让他回去了。此后一直在安庆画画，据说在山水画上还小有名气。

七七事变后，有一天突然有很多日本兵闯到我们家翻箱倒柜，我很害怕，不久父亲就不见了。听母亲后来讲，当时有人劝父亲去伪北大任教，父亲严词拒绝，日本人便有意为难他。父亲通过北京的一个朋友，买了车票，跑到天津，

从天津转到香港，再到海防，最后来到云南。父亲走之后的第二年，我和母亲以及表叔陈迺吉，还有母亲、乳母一家也离开了北平，途经上海时就给了一些盘缠，让他们回安徽老家去了，然后我和母亲到了香港。当时我们带着父亲的四大箱书，还有几十件行李，在香港大学遇到了父亲的学生马鉴教授，他劝说我们，母亲带着那么多行李又带着我，路上不方便，建议我们把书留下来暂存香港。这几大箱书就留了下来。这批书是父亲十多年来在北平收藏的古籍、手稿和信函，非常珍贵，可惜后来丢失了。

我们从香港到了海防，六叔把我们接到昆明。父亲到云南后开始是在蒙自，然后转到昆明，住在一丘田。父亲和母亲见面以后，只说了几句话，父亲就很生气。在我印象当中，很少听到他们两人有这种口角。那天好像是父亲责怪母亲说：“怎么不把书带出来，我以后怎么做学问，那些行李可以丢掉不要！”

初到一丘田，我们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大门旁边还有一块空地。没多久，日本飞机来轰炸昆明。有一次母亲在房间里，我和父亲匆匆忙忙跑出来，打算到房子外面的空地上，突然间，一架日机俯冲下来，飞得很低，我能清楚地看见那个日本兵戴着皮帽子和风镜，父亲马上抱住我，趴在我身上，这个场景在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我们租房的人家比较有钱，女主人抽烟的时候，经常打骂甚至用烟签子戳使唤丫头，父亲见了很生气，他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如此野蛮，更担心小孩子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利于成长，他在家里面发了几次脾气后，我们就搬走了。

我们搬到了西站附近的龙翔街。龙翔街靠左边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我们在耳房上租了一间。住在龙翔街一是为了父亲去联大上课方便，二是有利于跑警报。那时昆明跑警报首先是看看五华山上的灯笼，挂一个就是预袭警报，就要准备跑了。我早上起来，母亲就叫我去看五华山上是否挂上灯笼，一有灯笼我就回家报告，这时父母和我三个人便跑过马路往前走，大概走半公里就到了虹山。当时虹山一间房子也没有，小山坡上还有一块平地，我们花了点钱挖了一个山洞。在那里大概从10点左右，呆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回家。跑警报有时会有西南联大的学生遇到父亲，就和父亲一起跑，到我们挖的那个土洞里，拿着书读，还在里面谈谈学问和其他什么。

有次我们跑警报回来，家里房子虽然没倒，但是一上楼看，整个瓦面全飞掉了，没有了屋顶，家里到处都是灰尘。没有办法，就托人到官渡给我六叔报信，六叔找了个马车把我们家不多的行李运到了官渡，从此我们就住在官渡了。在官渡那段时间比较安全，因为敌机是不到那边轰炸的。

到了官渡，父亲心情也比较好一些，但生活还是很苦，西南联大的工资只够买点米，连买菜的钱都没有，就靠变卖我母亲的一些衣物首饰来维持生活。一段时间后，家里面能卖的也差不多全卖掉了。即便如此，父亲也从来没有缺过课。我们当时住在官渡一个叫六谷村的地方，父亲每次去上课，都要从六谷村走几公里的路到西庄火车站，从那里坐火车到昆明火车南站，再步行到联大来上课，晚上常常还要赶回来。当时父亲作了一首诗《西庄》，讲到 he 上课回来，我在门口迎接他的情境：

《西庄》

西庄地接板桥湾，小巷斜临曲水间。
不尽清流通滇海，无边爽气挹西山。
云含蟾影松阴淡，风送蛩声苇露寒。
稚子候门凝望久，一灯遥识阿爷还。

抗战中的那段日子我们的确是过得比较艰难，但父亲没有因为生活的变化而影响工作。他没有什么怨言，在那段时间还写了许多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

1942年，有西南联大的学生请父亲到普洱的磨黑教书。当时邀请父亲的西南联大学生的身份及背景，当事人前些年已发表文章说明了，但那时我们是不知道的。1943年初，父亲、母亲和我便动身了。我们先从官渡到昆明，住在火车站旁边一个小旅馆里面。大概过了两天，联大的四个学生就来接我们，他们分别是萧荻、吴子良、许冀闽和郑道津。我们一行七人先坐汽车到玉溪，从玉溪开始步行，一路上很艰辛。张孟希派来的大队马帮在前面带路，我们各坐一副滑竿，因为许冀闽是女生，特加照顾，也坐了一副滑竿，那三个男学生就走路，一天下来，只能走二三十公里。我们经过元江时，在一些路段会看到

白骨，甚是荒凉，这样前后走了大概半个月，千辛万苦才到磨黑。

到了磨黑后，我们就住在磨黑中学大厅旁的小耳房里，在我印象中还带有一个小院子。有一次听我父亲跟母亲闲聊，我才得知，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怒江，父亲见磨黑如此偏僻荒远，心想日本人恐怕不会来到这种深山老林。这个时候生活比较稳定，父亲偶尔去给学生讲课，有时也去到张孟希那里。张孟希虽然是个军人，但也懂些古文，经常来找父亲，两人在家里谈这些东西。当地有些士绅，也是盐商，他们有些文化底子，慕名来找我父亲，还请父亲给他们讲过几堂课。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普洱专署长胡道文请父亲去，我们便到了普洱。胡道文是个有文化底蕴的人，他和父亲经常说古论今，相谈甚欢，还特别请父亲做过几次演讲，由当地的士绅一起陪同。在普洱，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院内还设有一个电台，是专门用于报警的，看见日本飞机经过普洱就立即发电报到昆明，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日本飞机了，因为美国飞行队来了，管电台的人平常也没有什么事情。

1943年暑假开始时，我们回到昆明，仍旧住在官渡。但不久父亲就转到云南大学教书了，我甚是不解，后来才听母亲说，西南联大解聘了父亲。父亲到云大任教以后，就把他的两个学生要到云大来，一个是张为骥先生，一个是陶光先生。当时张友铭先生跟父亲交往也很密切，我们搬到云大晚翠园以后，两家经常在一起。张友铭还帮我补习过英文，我就拜他的夫人做干姐姐，所以我一直称张友铭为张大哥，称他夫人为干姐姐。

父亲到云大任教授的时候，已经不再跑警报了。不过父亲每次来学校上课，都需要从官渡步行到西庄火车站，乘火车到昆明南站，再从南站走路到云南大学，每星期至少跑一次，往返要走一二十公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如果经济上好点，偶尔也坐坐黄包车。

因为路程较远，有时父亲到学校上课，晚上回不去就借住在胡道文家，那时胡道文已经卸任回到昆明了。他家住在平政街，有两栋房子，就把父亲安排在前面的房子住，晚上两人还在一起谈谈学问、谈谈时事什么的。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经吴宓介绍又认识了孙乐斋，孙乐斋也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两人谈得

很融洽，不过是谈学问居多，孙氏信佛，一家人也都吃素。孙家住在青云路3号，就是现在的省文联，父亲有时也在他家借住，偶尔还在那里吃饭。

抗战胜利后，很多人要回北平，但北大、清华父亲是不想去了，后来中法大学邀请他回北平任教，安徽大学也曾经来信邀请父亲回去主持校务，都被父亲谢绝了，他留在了云南，留在了云大。那个时候熊庆来校长非常尊重父亲，西南联大不聘父亲，云大立即就高薪礼聘，给他的待遇比校长还高。熊校长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来我们家，嘘寒问暖，对我们的生活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留在云大也可能是父亲不想辜负熊校长的心意吧。

昆明时局稍稳定一些后，我们就从官渡搬到了孙乐斋家，租住孙家的房子，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熊校长就专门给父亲在云大枇杷园建盖了三间房子，还有一间厨房。枇杷园实际上叫晚翠园，院门上还有胡小石先生题写的“晚翠园”几个大字，可能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枇杷树，大家就习惯叫枇杷园。枇杷园住了几家人，一是杨桂官家，一是方国瑜家，还有一位美国女士，我们经常称她为Mrs. Jean，在云大教英文的，解放后就回美国了。此外，还有张德光家、张友铭家、秦瓚家，他们都住在这个园子里。

这个时期，父亲除了教书，偶尔也为别人写点墓志铭之类的文字。我原来只知道父亲给四个人写过墓志铭。1945年给冯友兰的母亲写的一篇墓志铭，此事载于《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给庾晋侯的夫人写过墓志铭。庾晋侯曾任过昆明市长，也是位园艺专家。给唐淮源写过墓碑。父亲对唐淮源很推崇，因为他是云南的抗日英雄。在磨黑时给张孟希的母亲写过墓志铭。后来查阅史料，才知道父亲还为范鸿仙写过行状，为张汇滔写过墓志铭。范鸿仙与父亲是好友，他亡命日本后加入中华革命党，后奉孙中山之命潜回上海，谋再举事。不料他的保镖遭人收买，深夜持刀行刺，致其身亡。父亲闻讯悲恸万分，亲自为其撰写行状。张汇滔系辛亥革命首义淮上军总司令，在“二次革命”中身先士卒，后遇刺身亡，国民政府为他举行葬礼时，特请父亲撰写了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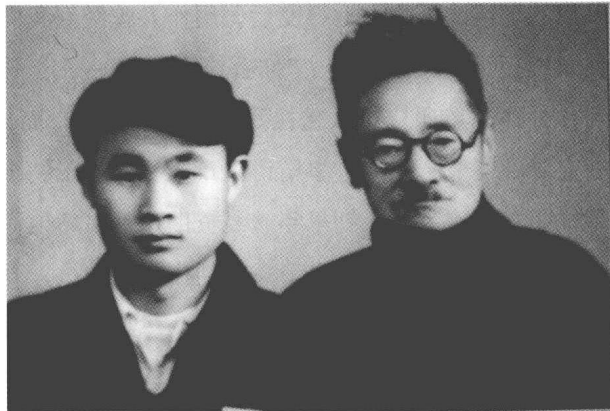
此外，40年代蒋介石六十大寿时，卢汉通过熊庆来跟父亲说写一篇寿序，作为云南送给蒋介石的贺礼。父亲答应帮他写了，写好后还请昆明的一位书法名家书写成一本折子，拿到我们家盖了图章才送过去。除了给蒋介石写了一篇

寿序外，父亲还给讲武堂的教务长李仪廷写过寿序，李仪廷威望很高，又是朱德的老师，父亲和他的关系也很好。

在帮这些人写墓志铭、行状以及寿序中，只有卢汉给了父亲一笔报酬，庾晋侯送了一些家具，张孟希送了一些烟土，其他人父亲分文未收。给张孟希的母亲写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西南联大教授的工资都相当微薄，父亲也不例外，家里基本靠典当度日，父亲迫于生活需要才出此下策。给蒋介石写寿序时，父亲已经受聘于云大了，熊庆来给他的待遇很高，他给蒋介石写寿序帮忙的成分居多。现在有些人说父亲是靠卖文章为生，我觉得是不靠谱的说法，不敢认同。

解放后，父亲就戒烟了。父亲说以前抽烟，现在社会变了要戒烟。父亲戒烟的那段时间很辛苦，需要去找医生烧一些烟泡子，就是用大烟制成一颗颗像丸子一样的东西，每天早晚用开水进服，很受罪，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大概经过两三个月，慢慢减少，后来就戒了。在我印象中，刚解放的那几年，社会秩序以及整个精神面貌非常好，夜不闭户真的是可以做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除了镇压一批“反革命”以外，也没有搞更多的运动。那时坐火车也都是互相照顾，乘客在车上还争着打扫卫生，社会风气确实是让人感到舒心。当时父亲跟我讲，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外国侵略，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扬眉吐气，帝国主义不敢来欺压我们，这个是最难得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精神面貌很好，从思想上从内心里确实是对党对毛主席有一种很深刻的很好的印象。

1954年，我考取了成都工学院，离家读书去了，以后的事情接触得比较少一些。期间，父亲给我的信中总说政府待他非常好，工作很好，身体也很好，鼓励我好好学习。我每次把成绩单寄回来他都特别高兴。我觉得我们家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是过得很幸福，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也非常好。母亲还是有点文化的，她从师范学校毕业，懂些古文，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词，父亲还赠诗给母亲，亲笔题写“赠给秋华夫人”，父亲称母亲为“秋华”，母亲称父亲为“叔雅”。父亲对云南、对昆明很有感情，他觉得昆明的气候特别好，适宜居住。对于火腿本身他其实并不怎么喜欢，但很爱吃火腿月饼。他还很喜欢云南的黄金离胡桃，是以前的一种水果，现在很少了，偶尔也能见到，但很酸，以前的更甜些。



刘文典与儿子刘平章。

我曾经问过父亲两件事情。一是关于对鲁迅的评价。我问当时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他说，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只是觉得鲁迅不应该跟那些人吵吵闹闹，与其把时间花费在吵闹上面，还不如多做点学问。他觉得鲁迅花费了很多时间跟人家打口水仗，和他弟弟周作人的关系也很冷淡，连亲情都不认，父亲对此有些不能理解。虽然父亲的观点是这样，但在搞民主运动的时候，显然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所以当时为此事受到很大的冲击。第二件就是给蒋介石写寿序的事。当时我还很小，根本不了解。后来有一次我从成都回昆明，便问起此事。父亲说他在安徽大学主持校务的时候，是为了维护学生的利益才跟蒋介石据理力争的，其实俩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领导大家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是有功的，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写寿序呢？父亲说，个人恩怨虽然瓜落结藤，但绝不记这些东西。这两个重要问题，是特别问他的，而平常我们在家里很少听父亲谈论张三李四的长短。

1956年，父亲被评为一级教授，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去北京开会。这段时间父亲心情舒畅，精神状态也很好。在北京开政协会议回来后跟我讲了两桩事情。一桩是他见到了周作人。不开会的时候父亲爱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查资料，在门口遇到了周作人，当时是3月份，北京还很冷，周作人看起来很不自在，低着头走进去，父亲主动和他打招呼，两个人寒暄了几句，没有提及

以前的事情。因为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曾经到我们家来劝父亲去北京大学，被父亲婉拒了。父亲就说：“你看这个人啊，一定不能当汉奸。我现在到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么重视我，给我坐汽车，而他是走着路去的。”他说做人一定要讲气节。另一桩事情讲到章士钊。章士钊跟父亲关系很好，他们以前就是好朋友。因为章士钊早年曾经资助过毛主席他们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毛主席念旧情，很关心他，也请章士钊作政协委员。开会时他们坐在一起，郭沫若从他们旁边经过，低着头就过去了，章士钊好像对郭沫若并不感冒。政协会上见到很多老朋友，像卫立煌、邵力子、张奚若、华罗庚，等等，父亲还跟卫立煌合影留念，可惜那张照片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还在成都上学，详情不是很清楚，加上父亲也没有跟我讲太多，我还以为没出什么问题，直到后来云大刘兴育老师给我看了当时的一些资料，我才晓得父亲最后还是受了冲击，不过当时整个情形就是那样子。1957年底我放寒假回到了昆明，有一天父亲突然吐血，我就急忙陪他到南屏街甘列明私人诊所去看病，照了X光片，好像当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1958年4月份，母亲说又吐血了，情况不容乐观，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据我夫人回忆，她当时在昆明工学院读书，我父母住在云南大学新村3号。她从昆明工学院出来，经过教学大楼前面的土堆就是我家了。那时我们还未结婚，父亲煮点牛肉或其他什么的，就会叫她来吃。50年代家里还没有电话，父亲便写信给她，信封都是用毛笔写的，所以她到收信处一眼就能认出来，是父亲又叫她去家里吃饭了。父亲过世那天晚上，我夫人正在上晚自习，家里的保姆去找她，说父亲不在了，她就赶紧过来。因为那时我还在成都上学，那一晚家里只有母亲、我夫人和保姆三个人守着他。第二天她去上课做化学实验时，旁边的助教说“国宝不在了”，她听着很不舒服，心里很酸，几欲落泪。

接到父亲过世的消息，我立刻赶了回来。当时在云大开追悼会，大概有一两百人参加，追悼会由白小松先生主持，白先生是位民主人士，时任省政协副主席，曾做过龙云的秘书长。1958年回来的时候感觉比较乱，没多久我毕业分到了昆明。而母亲隔了一年，觉得在云南容易触景伤情，便回安徽老家去了。

二、父亲的为人

我父亲是一位深爱自己国家的人，很有民族气节。记得七七事变以后，有人来动员父亲去伪北大教书，父亲不去。他情愿放弃家里用着几个人的优越生活，只身一人，从北平坐车到天津，然后从塘沽坐船经过上海、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再坐火车到云南蒙自。父亲跟我讲，他到蒙自的第二天早上，见到国旗升起，他深深地三鞠躬，他说，已经一年多没有看到国旗了。我觉得从父亲写的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分析文章以及他翻译的东西来看，应该看出他对国家的热望，对日本侵略者的那种仇恨。他觉得日本侵略者不仅要从肉体上消灭我们，而且还要从精神上奴役我们，要把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全部推翻掉，用它的文化来替代，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在这方面，他写了很多文章。

他作为一个文人，而且年纪大了，不可能拿枪，只能靠笔杆子唤起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九一八事变之后，父亲打算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天津《大公报》，1933—9—18. 11），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觉得父亲“不应该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父亲不这样看。他觉得“这些爱国志士连‘知己知彼’的古训都忘记了”，“自从沈阳事变发生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事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因此父亲“更觉得自己责任的重大，不能不愈加努力了。所以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飞翔的时候，我在下面笔不停挥的一气把它译完”。¹此书翻译出版后，社会影响极大，很多书店都供不应求。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写了《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一文（《云南日报》，1942—11—27. 2），以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敏锐地指出日本当局的狼子野心——“其布置的周密，计划的深远，处处都可以看得出他是早已处心积虑的在那里打算，决不是现时当国的几个人逞一时的意气，冒冒失失的把国家作孤注。”并大声呼吁国人“因这会的创痛而愤然觉悟，团结一致，御侮救亡”，而不是对于日本统一全世界，“将信将疑”，甚至“摇头冷笑”。²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写过一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的文章。文中详细分析了日本战败后我们应该怎样对他，是把他们全部杀光，还是其

他？他建议中国政府要把琉球群岛拿回来，这样才对我们国家发展有利。现在琉球群岛被他人占着，对我们有威胁，父亲当时就分析了这些问题，是很有远见的。

抗战中父亲很勤奋。在那种困难时期上课需要步行，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较远，一天要走十多公里来教书，但父亲一直坚持。对于学生，父亲的态度也不像外人谣传的那样不负责任。父亲是我夫人的干爹，我夫人曾经问过所谓“踢试卷”的事。她说：“干爹，人家说你批试卷是睡在烟床上，把试卷堆起来一脚踢过去，踢得最远的那份试卷分数最高，真有这回事吗？”父亲笑了笑，只是说：“干女儿，我如果是像这样教书，哪个学校还敢聘请我？”几句话已把情况说清楚了。

父亲对一些弱者也很关怀和同情。解放前，有一次父亲从云大出来，远远看到一个人躺在大门旁的墙边上，好似叫花子的模样，奄奄一息，父亲见状便马上过去问他，他没有力气回答。父亲便让家里的佣人送了一碗饭给他，还跑到青云街的警察局里，亲自去找警察局长，后来他们确实派警察把那人带走了，具体怎么处理就不得而知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也很大。

父亲对我的学习要求并不刻板，而是让我自由发展。我对文科没有太多的兴趣，更喜欢数理化一些，数学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父亲从来没有说让我继承或学他的东西，他让我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他觉得学理工或许还可以为国家多做些贡献。虽然父亲对我学习上的选择态度温和，但是对我的品行要求很严格，绝对不能讲谎话，只要讲谎话一定是要被痛斥的。他教育我做人要诚恳，不能随便批评别人，要诚信，要遵守诺言，从小父亲就给我灌输这种思想，让我终生受用。

父亲在生活细节上对我要求很严。他觉得人应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饭不能有声音，不能吵嘴或干其他的事，他最讨厌别人随便蹲在那里就吃饭。父亲的字写得不是很好，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小时候他有一个欧洲小人玩具，按一下就会撒尿，里面用来装墨水。后来这个小玩具摔坏了，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心思再练字了。父亲还说过一件事，他的一个学生，老师问他问题，每问必答，而且对答如流，结果有些同学就很嫉妒。通过细心观察，有学生发现他回答问

题时，手就捏着扣子，后来他们就把那个扣子给剪掉了，老师再叫他，他摸不着扣子，从此以后他就答不上来了。父亲说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不能养成。

父亲的性格其实很开朗。有时候他下课回来，路过家门前面的那个小院子，常常会有很多小孩在那里等他，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和小孩子们在草坪上滚着玩耍，我夫人担心他闪着腰，便提醒他注意，他说不怕，仍和小孩子们在草坪上玩。父亲很喜欢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欢跟他玩，小孩子爬树时父亲会喊他们下来，小心跌倒，还给他们买糖吃。据我夫人说，有一次云大老师们的小孩在礼堂里表演节目，邀请父亲去，父亲很认真地去理发，回来还洗澡换了衣服。我夫人说，去参加小孩子的节目怎么也要换衣服理发？他说，你看看全云大，就请了我一个教授，其他教授除了家长外没有请一个，我得打理得整整齐齐才行，他很清楚小孩子们请他去的意义。所以，说他“狂”或许是有的，但是他也很有人情味。

在我夫人看来，现在有些关于父亲的传说完全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她去我们家，最喜欢、感受最深的就是很温馨。她说，冬天的时候，干爹干妈一边坐一个沙发，前面摆着一盆炭火，两人吟诗作赋，你一言我一句，真有趣。我们都是学工科的，诗词文章懂得不是很多，但那种气氛，确实让人感到很温暖。我夫人跟我父母相处的时间很长，她在我们家也没听见父亲随意批评别人。

三、父亲的处世

父亲对他学生是很爱护很关照的。陶光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学生，1947年陶光到云大教书后，和我们家关系很密切，我现在还保存着几张他与父亲在大观楼和翠湖的合影。陶光时常约我父亲去看滇戏，一来二往父亲就喜欢上了滇戏。他说在云南要看滇戏，看京戏反而还不地道。就在看滇戏的过程中，陶光认识了滇戏名伶耐梅，并对其渐生好感。陶光后来要跟耐梅结婚，父亲没有反对，还帮忙成全。当时耐梅惹上了戏班子里的黑道势力，怕结婚当天出什么事，父亲就特地把庾晋侯请去了，当时庾晋侯在昆明还有一定的威望。婚宴就摆在商务酒店，当天平安无事。陶光和耐梅结婚的第一天住在酒店，第二天没有地方住了，父亲就向孙乐斋租了一间房子给他们。我记得他们搬进去的时候，还